

學仕化與社會隔離：大學生與當地居民

簡博秀*

本文部分內容曾於2013年5月30日，與吳貞儀同學以〈見習仕紳者：學仕化與社會融合〉為題目，發表於第十一屆土地研究學術研討會（臺北：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系）。

*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副教授

E-mail: titanbxj@mail.shu.edu.tw

收稿日期：2013.10.11；接受刊登：2016.12.26

摘要

本文嘗試從社區的空間尺度觀察學仕化發生所產生的影響，並且藉此說明臺灣政府對高等教育機構空間規劃上的一些迷思。這個迷思發生在政府試圖透過大學城的建設帶動地方的發展，以及連結高等教育擴充的正當性給予地方發展的充分理由。延續近年來西方文獻對學仕化與社會融合的研究成果，本文發掘發生在臺灣學生地區的學仕化過程其實是產生了社會區隔的現象——發生在臺南郊區新建大學的學生與居民的社會分化主要是來自於二個不同群體對地區的身份與定位不同所形成的。在研究中發現：藉由不動產投資所形成二元地景、公共安全的漠視、喧鬧的夜間生活、以及對當地社區認同感的缺乏等方面，都形成學生與當地居民產生社會的對立，也形成了在社區中二個群體彼此冷漠的社會關係。本文認為學仕化地區社會隔離的產生與學生的個人特質是有關的，畢竟比較仕紳者之於仕紳化，學生對於地方的歸屬感是極少的。重要的是，學生未成熟與短暫居住的特質則是對當地社區產生不少的負面影響，而這個負面影響正好否決了國家藉由設置大學帶動地方發展的脆弱假設。

關鍵詞：學仕化、高等教育機構、社會隔離、見習仕紳者、社區

壹、社會融合：從仕紳化到學仕化

現今的都市政策和許多的學術討論都期待仕紳化可以增加地方的社會融合，並且同時透過產生更多同質性的階層結構，減少社會衝突的可能性（Bulter and Robson 2003）。然而，另外一些學者卻認為，仕紳化，以及它所產生的取代現象，促成了在現今都會區空間極化的結果（Ley 1996; Smith 2003; Smith 1996; Walks 2001）。在許多研究西方城市的例子中，特別是在住宅資源較為缺乏且不動產租金行情較為緊縮所造成市場競爭激烈的地方，仕紳化很容易便導致高度的隔離和種族與階級的衝突（Betancur 2002; Smith 1996; Wyly and Hammel 2004）。近來Davidson（2009）在對泰晤士河沿岸新建的中產階級社區與它所鄰近的低收入社區研究中，再度證實：仕紳者與原居民這兩類不同社會層級而且鄰接的兩個社區，事實上卻是極少社會互動的。總括而言，這些對仕紳化作用的質疑，點燃了對仕紳化與社會融合彼此之間辯論，甚至於否定了仕紳化對都市再生的重要貢獻（Smith 1996）。

本文試圖從「仕紳化」（gentrification）對社會融合研究的經驗移轉做為「學仕化」（studentification）對同一主題的研究基礎，原因在於學仕化研究的發生與仕紳化論述的演化過程是有關的，尤其是學仕化是建立在同一個論述基礎下，不同的作用者——學生，所產生的結果。依循在這個傳統議題的討論，本文所好奇的是，學仕化是否如同仕紳化一樣，可以促成社會的融合？或者是，學仕化所達到的增加社會融合的目的，是否被視為積極的仕紳化效果（Atkinson and Bridge 2005）？或者是，在這個社會融合的過程與結果中，學仕化是否有不同於仕紳化的討論與反應呢？對於一個新的議題而言，這方面的先驗研究是相當缺乏的，並且相較於仕紳化已有的大量辯論，近年來學仕化才正開始吸引不同國家、不同領域的一些學者注意

(Boersma et al. 2013; Collins 2010; Fabula et al. 2015; Garmendia et al. 2012; He 2015; Hubbard 2008, 2009; Munro and Livingston 2012; Ordor et al. 2010; Sabri et al. 2009; Sage et al. 2012a; Smith 2005b; Smith and Holt 2007)。當然，這方面的研究則回歸到有關學生地理學的研究開端 (Chatterton 2010; Smith 2009) —— 「城鎮—畢業袍」 (town-gown) 關係 (Martin et al. 2005; Smith 2005b)，它包括傳統對大學生與城市中心之間互動的辯論與大學文化對城市和社區的影響等 (Chatterton 1999, 2000, 2010; Davison 2009; Fincher and Shaw 2011; Grabkowska 2011; Holt and Griffin 2005)。

本文調查的空間範圍以臺南市中心北部郊區二間「新建大學」 (new-build university) (H管理學院和L大學) 為中心，以及這二間高等教育機構所涉及的地方社區與空間。這個地區相於市中心而言，屬於較為傳統的農業社區，當地居民仍以一級產業為主要的生產活動，社區內的組成以老人居多，較少新建的居住大樓。選擇這二所學校的理由，一則不外乎他們代表了臺灣高等教育擴張政策之後的結果，是政府政策下的產物。再者他們充分地說明臺灣學仕化後的空間影響，從「沒有」到「有」的過程，相較於傳統學校有較為明顯的空間結果。二所學校分別於1990年後期在這個地區設置，先後加入臺灣的高等教育聯合招生系統，然而近年來因為嚴重受到「少子女化」 (the trend of fewer babies born) 的影響，加上報章媒體與公眾輿論等對高校體制的批判，接連導致學校學生的招生狀況無法滿足學校總體投資的效益，因此近幾年前後退出高等教育的招生系統，企圖以個別招生的例外模式維持學校的基本財務平衡。本文將研究焦點放置在這兩所大學與鄰近社區發展的動態分析上，一方面藉由臺灣高等教育機構的發展過程說明臺灣學仕化的發生背景與內容，另一方面則企圖藉由臺灣的發展經驗回應學仕化的實質討論內容，並且試圖找出具有臺灣學仕化空間地理的不同特色。研究中分別透過深度訪談、焦點團體

法與田野調查等方法完成研究的成果，訪談與調查的時間介於2008年至2016年之間，結果透過文字與相片的紀錄彙整做為本研究的基本分析資料¹。除了前言，文章分為四個部分：首先，針對有關學仕化與社區發展之間的關係提出理論性的討論，然而受限於這個新進名詞有有限的成果，許多有關學生與原始社區社會之間的討論則借鑒於紳仕化的豐碩辯論經驗，引用做為學仕化的理論參考，特別近年來大多學仕化研究都聚焦在這個主題之上（Garmendia et al. 2012; Hubbard 2008; Sabri et al. 2009; Sage et al. 2012a, 2012b, 2013; Smith and Holt 2007）；其次，則針對現今臺灣學仕化的發展背景和路徑提出說明，其中，這個路徑與近二十年來臺灣高等教育擴大招生的歷史進程是有關的，這部分則證明兩個不同地方研究的理論借用基礎（簡博秀 2011）；第三部分則以臺灣南部二所都市中心的郊區大學為例，透過學仕化論述倡議者Smith（2005b）所建議的四個不同影響面向，說明在新建大學成立後當地社區互動的結果，以及對這個地方社區的影響，其中以「鄉村地景的分化」、「公共警覺的疏密」、「晝夜間生活的反差」與「地方認同的分歧」的四個主題說明。最後則是結論。

1 本研究的調查時間持續自2008-2016年之間，調查的地點以臺南市北部郊區的H學院與L大學為中心所影響的鄰近社區為範圍，其間動員了10多名臨時助理協助調查與紀錄，以及4名研究助理進行深度調查與訪談。整體研究採取以下的方式進行：1. 半結構性的訪談（semi-structure interview），包括的對象為與學校、社區與學生三者之間相關的關係人等，每位受訪者依不同主題進行訪談，時間維持在1-2小時半不等（受訪對象與條件詳細說明於附錄）；2. 焦點式訪談，進行的對象為學生（HS），分別進行三次的座談，主要主題為學生對所居住社區環境的印象，與描述他們的生活方式（受訪對象與條件詳細說明於附錄）；3. 會議紀錄（HMOmeeting），共計2次，為H學院針對學生租屋安全所舉辦的租屋座談會會議紀錄，出席者為附近地區的租屋業者，會議主持人則為校方代表，包括學務單位和教官等；4. 田野調查，包括對附近地區進行不動產市場調查與商圈調查，前者主要針對該地區內所有不動產出租物件進行調查與紀錄，並藉由地圖記錄所有物件及承租條件，以及租金與出租狀況，後者則以學校與附近本湖寮商圈為調查範圍，主要調查商圈內店家經營項目與規模，並抽樣詢問營業狀況與服務客戶的來源，上述二項調查分別以表格與圖像做為紀錄，做為比較發展前後的依據。

貳、學生扮演的學仕者

自2002年開始，學仕化這方面借助於仕紳化經驗的創新研究，由D. P. Smith (2005a) 展開，他奠基在「學生地理學」(student geography) 的研究基礎，並且適切地接軌在第三波仕紳化的研究轉型過程中，建構成為現今學仕化研究的內容。概念上而言，學仕化意味著藉由較小尺度的制度角色 (small-scale institutional actors) ——如不動產所有權人、投資者和開發者，以「多重家戶的住宅」(houses in multiple occupation, HMO) 模式生產與供給住宅給這些學生的轉換過程。其中這個定義最具特色的現象，便是「來自於學生所居住的鄰里社區中所產生矛盾的社會、文化、經濟和實體的變遷」(Smith 2005a)。這個用詞的發生與1990年代後期英國教育政策擴充高等教育機構是有關的，而且這個全國性的空間擴張現象不只是為了提升全英國的人力素質而已，同時也刺激更多的地方興建與設立大學，使得大學與地方發展的議題，透過Smith與他的同僚等人的定義而浮現在學術的討論中 (Smith 2005b; Smith and Holt 2007)。這個有意比照仕紳化的研究主題，除了同樣說明社區生態侵入與承繼的社會變遷過程外，研究的標的則由中產階級轉化為學生族群，以及它所帶來對原始社區的不同影響而有不同的詮釋。重要的是，學仕化的發生與高等教育機構是密不可分的，並且學仕化的現象對地方產生了獨特的都市地景與特殊的生活方式，而這個地景與生活方式所暗示的社會和文化的面向是需要更多學術的關注 (Van Liempt et al. 2015)。

然而，現今研究的主軸對這個「學生與社區之間的互動」議題的討論，大多聚焦在大學設置後對地方經濟的衝擊 (Hall 1997; Harloe and Perry 2004; Lambooy 1997)，遠多過於社會融合的質疑。對這個空間研究缺乏興趣的可能理由則是——學生居住的短暫行為模式很困難以簡單的「都市社會隔離理論」解釋與描繪 (Hubbard 2008)。畢

竟，學生在社區的社會和空間階層裡占據了一些心理與生理都非常矛盾的地位——譬如，一方面，他們經常被描繪成是文化上不同類型的表述（Chatterton 2000）、主要來自於中產階級的背景（Dorling 2005）和擁有較高價值觀與專業訓練的知識（Smith 2005b）等；另一方面，他們卻被指稱是一群無功受益的（Scott et al. 2001）、對地方社區生活沒有貢獻的（Armstrong et al. 1997）、和從社區主流生活所排除（Chatterton 1999）的臨時性居民。因此，在這些頗具爭議的議題之下，使用仕紳化的語言和概念將有助於學仕化去解釋與整合這些不同的觀點（Ley 1996; Smith and Holt 2007），它不僅可以描述這個空間邊緣化的過程與結果（Winchester and White 1988），甚至可以突顯學仕化在這些不同仕紳化作用下所發生的不同現象與結果。

相對於仕紳化之於仕紳者—中產階級而言，在學仕化的過程中學生所扮演的，其實只是一個「見習仕紳者」（apprentice gentrifier）的角色，它對空間的影響明顯相對是較少的（見表1）。因為學仕化中的學生是有不同的身份與生命成長週期條件的：學生的心智年齡與環境條件本身便是一個具有獨特文化與特性的族群，尤其相對於仕紳者而言，他們是年輕的、季節性的和短暫的（Smith and Holt 2007）。「年輕的」是指他們年齡大約介於19-25歲之間（10幾歲世代的後期與20幾歲世代的初期），「季節性的」係指一年大約只有2/3的時間會留在居住的社區裡，不包括寒暑假，而且一年分別有二次約5個月的停留，而「短暫的」則是說明這些學生普遍僅只會在這個地方的社區停留約4年左右的時間，甚至於每年都有可能移動。所以，Smith（2005a）認為社會階級基礎的轉換或社會地位提升都沒有充分反應在學仕化的發生過程中，因為學仕化包括了個人群體的短暫移入，而這些個人通常是在他們生命過程的早期階段便遭遇學仕化的歷程，而與慣例的仕紳者不同。像這些移入者的特徵大多是單身且無子女的年輕人，擁有有限的經濟資本且尚未固定性地參與在勞力市場的工作分配中，僅只嘗試尋求暫時的居住空間，並且藉著有限的

表1 仕紳者與見習仕紳者的比較

仕紳者	見習仕紳者* (或初階仕紳者)
仕紳化	學仕化
(消費者)中產階級	大學生(消費者)
擁有家庭,或有社會經驗的青壯年人	單身且無子女的年輕人
替代當地的工人階級	取代當地的工人階級
擁有經濟資本,已在勞力市場中占有一定的工作地位	擁有有限的經濟資本,且尚未固定性地參與在勞力市場的工作分配中
在生命週期中選擇較為長久的居住空間	尋求暫時的居住空間
住宅條件的移轉與仕紳化地區產生關聯	有限的住宅條件(租賃與多重家戶住宅),與學仕化地區產生關聯
社會融合與隔離的辯論	社會隔離*
有助於社會階級基礎的轉換或社會地位提升	與社會階級基礎的轉換或社會地位提升無關
對地方的不動產價格有正面的提升	未證實對地方的不動產價格有正面的提升,反而形成所謂的「學生貧民窟」

資料來源：*參考Smith and Holt (2007) 與Smith (2008) 定義。本研究整理。

住宅條件與學仕化地區產生關聯（儘管有些高等教育學生在畢業後仍會留在當地）。由於學生的這些特質，對一個接受大量學生「入侵」的社區而言，他們明顯在這個社區裡進行許多不同方式的消費活動，但卻對社區的一切事務是相當隔離與冷漠的，且缺乏對地方的歸屬感（belongs），更不需提及他們在社區可能具有的政治參與權利（Smith 2008）。

英國大學（Universities U.K. 2006）為了有效地掌握學仕化與地方社區變遷之間的脈絡，詳細地描繪學生生活與活動對於地方、或社區的具體影響，他們借用Smith（2005a）所建議的分析面向——包括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與實體的，詳細建立與說明學生人口對鄰近社區所產生的積極影響與社區所面臨的挑戰。除了提醒高等教育有關的行政單位必須重視這個衝擊與影響之外，甚至建議學習如何

去調節與管理這些內容²。這些內容都提供了一些評估學仕化對地方和社區明顯影響的項目，同時也刺激研究者對這個主題的關心與興趣（Chatterton 2010）。即使一些學者提醒學仕化對空間與社會的影響，但讓我們所好奇的是，這些「見習仕紳者」的具體影響到底是什麼？事實上，不同的觀察面向與不同的觀察者對學仕化這個議題，都有不同的觀察結果，但這些結果並非暗示學仕化這個字帶有「問題」的意味，也並非它是一個問題。其實對一些大學城鎮而言，學生大量地成長與集中，將有助於地方社區的發展，然而在沒有控制與不同社會、文化與經濟條件下的衝擊，卻又是無可避免的（Munro et al. 2009）。因此，藉由高等教育機構的制度性操作，學生社區所具備的高度集中與明顯的人口替換過程是城市的特殊面貌（Bromley et al. 2007; Munro et al. 2009; Munro and Livingston 2012; Woldoff et al. 2011）。重要的是，在學生社區內的人口替換次數是相當頻繁的，甚至於過高的替換過程經常導致在許多城市中社區的衰敗與快速折舊，以及生活條件的惡化。

有些研究認為，學生會被地方所提供的現代化消費所吸引，就某種方式而言，會與大學城內的仕紳化過程同時發展（Devison 2009）³。因為學仕化經常是大量占優勢的中產階級學生，逐步地取代已有的工人階級的過程，同時地方中心內吸引消費的娛樂場所，通常是為了學生這類青年人口所設置的，既方便又是以夜間生活為主的（Chatterton 2000; Chatterton and Hollands 2002; Hollands and Chatterton

2 針對學仕化成為英國許多大學的普遍現象，英國大學（Universities U.K.）在2005年啟動了一個調查計畫，他們透過Brighton、Canterbury、Leeds、Loughborough、Manchester/Salford和Nottingham六個地區的案例調查，定義學仕化的內容與評估學仕化對地方的正負面具體影響。請詳見<http://www.universitiesuk.ac.uk/highereducation/Pages/StudentificationGuide.aspx#UxAbtPmSx0M>。臺灣已有學者翻譯其中的內容，請參考吳貞儀、簡博秀（2009b）。

3 如在Devison（2009）對墨爾本市中心區的研究中發現，學仕化是促成之後仕紳化的主要原因。

2003; Smith 2005a; Tallon et al. 2004)。儘管如此，學生在社區，以及學生與社區之間的關係是受到大多數學者所反對的，這些論點支持在學仕化地區仍有階級的存在（Holdsworth 2009; Holt and Griffin 2005; Wattis 2013）⁴。在Sage et al. (2012b) 的最近研究中定義了學仕化所呈現社會隔離的「差異地理學 (diverse geography)」現象，並且與仕紳化有所區別的。在他們從Bevendean的社會出租住宅 (social-rented housing) 調查中發現，由於學生對於成本與方便性的考量，使得這些住宅因為英國的學仕化過程後逐漸地轉換為學生出租住宅使用，而形成學生「侵入」這些地區的現象，而形成所謂的「學生地區」 (student area)。然而，在他們調查成果中發現，這些地區原本都是位於城市郊外較為貧困的社區，卻因為學生對環境維護的忽略與生活的隨意而使得問題更加嚴重。租賃在這些所謂社會住宅的學生與當地原有的私人租賃的居民產生許多的衝突，但卻同時混雜居住在相同的住宅空間之中。Sage et al. (2012b) 發現，這個問題遠多過於社會多樣化與租賃所帶來的社會利益。延伸這個議題，之後Sage et al. (2013) 把近來在許多英國城市推動「新建學仕化」 (new-build studentification) 的策略提出討論，認為透過大量興建新的學生租賃住宅，移轉學生的影響到所謂的「有目的興建的學生住宅」 (purpose-built student accommodation, PBSA)⁵，並未可以解決學生與地方民眾之間的衝突與對立問題。另一個有趣的研究在Garmendia et al. (2012) 的成果之中——他們認為發生在西班牙城市大學裡的學仕化現象，並非是鄰近大學校園的整棟建築物而已，有些不動產產權租賃給學生是以大樓內的單一住戶為單位，並且零星地散布在較大尺度的住宅大樓之內，因此，他們把這類型發生在大型住宅大樓的租賃

4 這方面反對學生或年輕人對社區產生負面影響的研究，除了上述傳統社會隔離理論對「高等教育機構與社區」的辯論之外，尚包括研究夜間經濟的論述中對大學生與年輕人反社會行為的描述，特別是涉及酗酒文化的影響 (Demant and Landolt 2014; Hollands 2002)。

5 參考引用自Hubbard (2009) 對兩種不同學生住宅方式的定義。

airiti

移轉現象，稱為「垂直的學仕化」（vertical studentification）；他們不只把學仕化的空間影響更細化到街道的空間層級，甚至於描繪到出租學生公寓的公共樓梯間內，說明學生的特殊生活文化與型式對這些原始傳統社區的影響，以及鮮少發生的社會互動結果，同時這些負面的影響降低傳統居住民眾的居留意願、破壞居住品質、以及必須忍受逐漸下降的不動產價格。

儘管上述代表性研究分別在郊區與城市中心展開，但是藉由高等教育機構對當地社區的影響是不容拒絕的結果。重要的是，與本文論述有關的，學生聚居的集體現象明顯是與當地傳統居民社會分離的，同時也的確對當地居住的民眾產生許多不同的且負面的影響。因此，這些議題提醒了一個事實，與仕紳化論述所不同的——儘管大學生對短暫居住的這個社區認同感是冷漠的，卻很難拋棄這個事實——學生在求學的階段中與這個社區的發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但卻又是如此分離的。如果完全忽略這個排他性的因素，便很難看到現實生活在這二種不同族群的空間疊合與矛盾。這如同Sage et al. (2012b) 對傳統居民的描述：他們就像居住在「不像我們一樣的人」（people not like us）旁邊一樣，因為這些學生的生活方式與生活態度幾乎是完全不同的。這個區別且隔離的不同地理學現象，遠低於仕紳化所談論中產階級對當地的社會融合程度，原因則不可避免地歸因在：這些學生只是個「見習仕紳者」，而非全然的仕紳者罷了。

參、臺灣的學仕化與高等教育機構的擴張

如同其他先進國家發展的軌跡，臺灣的高等教育發展歷史與國家經濟發展的需求條件是完全契合的，並且高等教育的政策與臺灣的社會需要亦是相輔相成的。光復之前臺灣高等教育僅集中在少數社會階級的機會選擇之中，在民國四、五十年代教育普及與擴張伴隨著國家的經濟起飛與進出口成長同時地發展，取得大學學歷的機會相對地提

高了許多；民國六、七十年代則配合產業結構提升與社會的轉型，高等教育不再只是少數人的專利，大學生的名額相對也有所提升；更相似的事實則是與近年來臺灣積極地融入全球化競爭與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的發展路徑相仿，它說明了臺灣高等教育在近二十年來急速擴張的現象，已經讓臺灣的教育水準達到普及化的階段（林生傳 2004）。首先，具體的事實則表現在高等教育機構數量上的增加：就臺灣初期的高等教育而言，在1945年之前僅有1所大學，至1953年則有4所大學院校，1983年則增加為28所，然而接下來的階段，則由於政府一方面開放設立私校，同時也鼓勵許多專科學校改制大學，另一方面則擴充國立大學的規模與數量，使得自1983年到目前這二十年來的學校數量增加至164所，這一階段的大學數量成長率高達3倍以上。其次，大量的高等教育機構的設置同時提高了學生的就學率，自1980-2004年止，高等教育的就學人數由342,528人上升至1,285,867人，成長將近3.75倍（郭碧英 2006）；而依當時就學人數的就學狀況來看，從民國八十七年到民國九十六年的「粗在學率」則由46.98%上升到85.31%，「淨在學率」則由33.32%上升到61.41%（柯鴻彬 2008），很明顯地，這二項指標都有二倍以上的成長，而重點在於，現今在臺灣已有將近八成以上的18-21歲人口在高等教育機構就讀。

近二十年來高等教育機構數量急遽膨脹的現象，與發生在臺灣1990年代初期的民間教育改革運動是有關的。當時改革的重要動機則來自於民間團體對於臺灣教育制度的期待，以及試圖透過臺灣的開放民主機制為未來的教育政策提供正確的目標，尤其是對於臺灣過於嚴苛管制的教條教育環境與狹窄限制的升學管道所產生的反彈與不滿意情緒，形成了當時一連串的教育改革建議與實際舉措。在當時大多數的民間教育團體的建議與要求下，「廣設高中、大學」便成為其中一項重要的訴求。之後，在教育部放鬆對於私立學校設置的管制與扶植私立技職院校轉型的政策指引下⁶，於是有了近二十年來的高等教育

6 為了達到廣設大學的目的，臺灣政府利用「開放許可」的方式，藉由私立學校設置條

機構大量蓬勃發展的光景，這便是臺灣近年來高等教育機構廣設與擴充的基本濫觴（薛曉華 1996）。於是，目前臺灣供過於求的高等教育機構數量，以及偏高的高等教育就學率，則成為現今高等教育環境的特殊現象。然而，過於普及的教育機會所降低的學習成果，反應了臺灣高等教育素質的問題，近來成為眾多公共議題所反省的主軸，同時這個議題，甚至在臺灣「少子女化」⁷的浪潮趨使下擴張問題的嚴重性，讓這些嚴重供過於求的不均衡現象更加地挑戰高等學校管理層級的策略智慧，同時暗示過去過度擴張的高等教育政策的謬誤（戴伯芬等 2015）。

與英國學仕化所面對的背景相似的，大量增加的高等教育機構數量是臺灣學仕化的一項特徵，尤其是大部分的模式來自於原有教育學制體制的調整而達到擴張目標——如專科學校轉型為科技大學⁸。然而，如同一些研究者區別英國「精英與紅磚大學」（elite and red-brick university）的定義（Chatterton 2000）⁹，在這些臺灣的大學之中，由於設置的制度環境、原因、類型、乃至於它的區位等因素的不

件的調降與國有土地租賃的開放，降低私人設置學校的門檻，鼓勵私人興學投資學生市場，彌補當時大學規劃數量不足與就學率偏低的困境。這些調節的法令機制給予了私人興辦高等教育機構的誘因，包括在申請上土地取得的便捷與較低的貸款利率等。

- 7 儘管「少子女化」的問題大量開啟了一些對臺灣1990年代中期大學發展政策的爭執，也點燃了開始檢討廣設大高等教育機構制度的迷思，但是這個斟酌於未來人口變化趨勢的議題，無法像學仕化如此有理論性地導入制度性的角色，也無法廣泛性地陳述以學生為中心的空間生產，較為狹窄的研究內容最終較少落入地方層面的觀察，或者只是反省臺灣人口變遷對社會或文化整體層面上的衝擊，缺乏連結公共政策原始初衷的回應與批判。因此，藉由學仕化的空間效果嘗試說明臺灣高等教育機構與國家，以及與地方社區之間辯證關係，是有其必要的。
- 8 以民國90年代的教育部統計資料（教育部 2011）算起，自民國90年起一般大學共計有68所，至99年則增加3所；在同一時段，科技大學則從12所迅速增加至46所，而技術學院則由原有的55所縮減至31所，縮減的數量與增加的數量是相當的。實際上，在這個時段裡，一般大學的增設已趨於保守，唯有從技術學院改制為科技大學的增加趨勢是持續的。
- 9 Glasson（2003）認為現代化的大學設施對地方和區域經濟的發展是有相當的裨益，傳統已存在的大學則不會花費太多的思考去滿足地方和區域的需求。Chatterton（2000）則認為傳統的、紅磚牆的，且重視家長作風（paternalistic）的舊大學與現今新的且提供大量社會服務的大學最大的區別，在於後者在設置時比較重視區域的尺度，以及滿足國家政策的需要。因此，多數舊制的大學與地方的發展條件保持分離的超然立場，同時大多聚焦在國際研究的優勢，而非提供社區教育為首要的目的。

同，將很明顯地影響學校的體制治理和績效表現，以及它與地方社區之間的關係。以臺灣的經驗來說，在高等教育機構廣泛升格與設置的1990年代做為時間斷面，新的學校的設置發展與過去具有傳統歷史的高等教育學校是非常不同的：這些所謂「新建大學」（new-build university），他們是臺灣高等教育的新的生力軍，從選地建校到興建校舍，以致於加入高等教育體制到營運招生，都是在近二十年來逐步完成的，與1990年代即已成立的傳統大學，或轉制科技大學不同的：一方面，新建大學是與都市化無關的，他們受限於開發的規模而遠離人口稠密的市區，甚至接受國家的優惠安排而來到低度發展的郊區或鄉村，並且在臺灣的高等教育與地方發展共同目標的邏輯掛鉤下，經常要負擔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職責，並且明顯地要為地方帶來投資的誘因；另一方面，他們是既有市場的後進者，必須接受現有學生市場分配的挑戰，尋找自己的利基市場（niche market），企圖維持自己的永續經營。殘酷的是，少子女化的衝擊是這些學校不得不接受的事實，同時對一個沒有經營經驗或區位失去優勢的新建大學而言，他們在臺灣高教體系的地位與排名是被低度評價的¹⁰。因此，臺灣的新建大學在國家政策明顯地介入下是市場的弱勢者，他們面對市場整體變化的衝擊遠多於傳統大學。

接下來，本文所要驗證的案例便是屬於這類型的新建大學，他們的設置與發展是緊緊與國家的政策導向相連結的，並且承擔了地方的期待（簡博秀 2013）。文章中的案例之所以被選擇做為研究的對象，如前所述的：一方面這二所大學代表了臺灣的大學擴招之後所成立的新建大學；另一方面，這二所大學的設置地點位在都市外的郊區

10 因為少子女化的影響，造成臺灣有所謂的「百分以下上大學」的教育省思與政策辯論，嚴正批判臺灣過度擴張的高等教育市場，並且對於接受這些被定義為「程度不足的」學生的學校提出質疑，甚至將這些學校的名稱編排成為一句戲謔的簡稱——「到（稻）德國真遠」，然而這些學校大部分都是1990年代新建（或擴張）的大學。更重要的，這個議題透過媒體的炒作大肆渲染，增加了大眾對這些學校的誤解，無異對這些學校艱困的招生情況雪上加霜。

且低都市化的地區，學校設置以後對社區的衝擊是非常顯著的，儘管之後的少子女化停滯了學任化的進程，但從沒有學生到大量學生進駐，的確為這個鄰近社區與原始居民帶來不同以往的生活體驗。

肆、學仕化與社會融合：以臺南市的H管理學院和L大學為例

本文調查的空間範圍以臺南市中心北部郊區二間新建大學（H管理學院和L大學）為中心¹¹，以及這二間高等教育機構所涉及的地方社區與生活領域。依地方人士對這個地區的行政界定，大約是臺南市安南區本淵寮與相鄰的十二佃兩社區所包括的地理範圍（見圖1），其中本淵寮是安南區大多數行政分支機構設置的中心，而二所學校則設置在十二佃鄰近社區。當時二所學校設校於此，主要受限於都市土地成本較高與降低投資風險有關，且此處為原有國營事業（台糖公司）所擁有土地，當時配合國營土地的出租解套¹²，提供了高等教育學校最基本的設置校地門檻土地。二校分別於1990年初期在政府開放與鼓勵的政策下申請與設置，並且在1990年代後期先後加入臺灣的高等教育聯合招生系統，正式成為臺灣高等教育機構的正式成員，搭乘上臺灣高等教育機構擴張的末班車。當時設校的目的，與國家開放的教育政策是有直接相關的：「教育部為配合國家工商業之發展，力求高等教育資源分配，縮短城鄉差距，規劃在臺南地區各縣市至少設有

11 本文所指的臺南市係指在2010年中華民國縣市改制直轄市（即所謂的五都升格）之前的臺南市，未包括之後合併的臺南縣部分。而市中心的概念，亦以原有臺南市六個行政區（中西、北、東、南、安平和安南區）的中西區而言，為當時臺南市區最主要的商業活動所在區域。本文所研究的安南區，則位於北區以北的範圍，與原有臺南縣的永康市、安定鄉、七股鄉等鄉鎮接壤，離市區約20-30分鐘路程。

12 參考同前註2。以H學院為例，該校第一期總投資金額總計預估為二億四仟九百七十萬元，其中包括校舍建築、教學設備和土地租金及前二十年權利金等部分（H管理學院 1997）。由於該校土地是向臺糖承租的國有土地（約10公頃），若換算為自有土地，則費用將更高於預估的金額。



圖1 本研究調查樣本鄰近空間範圍（安南區大學城）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另自行整理繪製。

一所大學院校，並鼓勵私人興學，使學校教育和各縣市發展工商業計畫相配合……」（H管理學院 1997）¹³。另外，就私立學校的角度而言，這個高等教育機構的投資，除了被視為一種兼具公益與私利的投資管道之外，不外乎是為了協助培育人才、配合產業需要、帶動地方發展、均衡區域發展等的目的。

然而，這個地方所呈現的現實矛盾是非常明顯的。當初二所學校的設置對地方而言是一件激勵性的大事件，除了中央政府主導性地放鬆對國營事業土地的租用限制，並且提供許多誘因鼓勵私人興辦大學之外，地方政府亦配合都市計畫的變更以符合設校的標準，提供學校正式地在臺南市的轄區內設置。在地方企業與民眾的期待下，學校從

13 在當時設校申請書中的說明是：「提供臺南科技工業區人力之需要，協助培育人才，發揮建教合作功能，藉以促進生產及經貿更加進步，使國力更加強盛」（H管理學院 1997）。

選址、申請設置與開始招生都吸引了地方人士熱切的關注，並且提供具體與積極的行政便捷協助學校的設置¹⁴。但是，十多年下來，這個地方發展的美夢卻未必如同預期的美好，在經歷設校初期四、五年短暫的學仕化榮景之後，繼之而來的臺灣少子女化衝擊重新調整了地方對於大學城的夢想：一方面學校經營的成效並未帶來當初推估的經濟規模¹⁵；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學生，這些「見習仕紳者」的到來，對地方的正面貢獻遠低於預期的假設，甚至帶來了不少負面的效果——這如同一些先驗研究者對所建議的，這些「住在我們隔壁的人，卻不像我的人」（Sage et. al 2012b），對當地居民而言——其實是個「麻煩人物」¹⁶。

大學在這邊可能會帶來繁榮啊，可是沒有啊！沒有啊！帶來的只是一些困擾而已啊！（R06：p.1，女性，本淵寮居民，當地居住50多年）

-
- 14 當時在選擇校址時，許多地方人士與民意代表都參與校地的籌劃與行政事務的協助。以地方說明會為例，這個會議舉辦的目的是在於讓當地民眾瞭解學校的開發計畫，以取得當地民眾的同意，方便於未來學校開發的進行，同時這個會議紀錄也成為行政單位核定同意的基礎。為了達成這個目的，許多地方人士都積極地投入這個會議前的協調工作，以保障會議的進行不會有太多的地方阻力（C01：p.20，女性，里長，第二次訪談）。
- 15 自96學期（2007年）以後，兩所學校招收學生比率逐年減少，每年呈現約1,000人的人數下降，使得學校的經營規模開始產生困境。以L大學為例，從學校自民國90年代開始招生以來，學生人數由開始的2,056人，依年級的開班數逐年上升至93學期（2004年）的6,606人，之後則逐年下降，最低則一直到100學年（2011年）的1,818人，其中從96學年（2007年）開始便以每年約1,000人數的減少。而H學院學生人數的變化則與L大學相同，93學年（2004年）到達學生人數最高點，為5,211人，但是到100學年（2011年）全校學生人數則下降到僅為809人。這個藉由少子女化對學校的衝擊，不只是產生學校嚴重的經營危機，對學仕化地區的地方發展亦產生不同的負面影響。一些以學生為主要服務對象的消費活動，都不免因為學生的減少而調整投資策略，這些活動包括位於本淵寮廟口的夜市、影印店與出租的學生宿舍等（訪談紀錄B01，男性，當地複印店家老闆；B02，男性，當地夜市店家經營者；HM001，男性，H學院三年級學生）。
- 16 里長引用了當地居民的描述，說明本來其實社區內的居民都是很期待大學生來到社區，以為為這裡的社區帶來很多活力的，是有「好康的」。但結果是「生雞蛋沒，放雞屎有（臺語）」（C01：p.14，女性，里長，第一次訪談）。這說明了當地對大學設置的期待其實與現實有很大的落差，而且學生帶來的負面影響更是當初沒有預料得到的。

以下，本文則藉由描述1990年代後期以後發生在這個地區所經歷的學仕化過程，並且做為分析與研究的基礎，描述其中所呈現社區居民與學生之間的社會互動與融合過程，並且提出屬於臺灣學仕化的特徵與內容。為了回應本次學仕化最原始的調查成果，本文參考英國大學（Universities U.K. 2006）以社會、文化、實體和經濟四個面向中所提供的事實項目，說明發生在這個地區的社會隔離的現象，分別以「鄉村地景」、「公共安全」、「晝夜間生活」與「地方認同」等四個面向提出如下的描述。

一、鄉村地景的分化

大學城的設置為這個鄉村地區帶來了不少的投資機會，儘管這個地區一直以來皆是臺南不動產市場交易最不活絡的地區。一旦正式發布二所大學要設置在這個地區的當時，的確吸引了許多投資客與地方財團，來到這個地區大量的收購土地（RE01：p.10）。這對安南大學城地區的地方發展而言，是一項明顯預期的投資效益行為。這主要的原因則是來自於學生集中學校鄰近地區的考量，牽引不動產投資者在區位投資上的偏好：

學校的入駐，當地住家獨棟的租金有提高。……店面的也有，都有帶動起來，是從住家開始漲的。（RE01：p.12，男性，安南區地方的不動產經紀業者，從業20多年）

那時候兩間學校蓋在這邊的時候，大家都說我們公塆仔（近十二佃）有好康，說我們這邊發展很快之類的……那時土地一片大概三萬（元），要賣四萬五（元）。（R011：p.6，女性，十二佃居民，當地居住60多年）（括號內的文字為作者解釋說明）

從當地的不動產實地調查的資料顯示，這些預期由學生來臨所帶

動的不動產投資模式，依投資使用性質的不同，可區分為住宅與商業使用兩種類型：前者則是提供學生居住為主的出租住宅；後者主要是以零售消費為主的單一商店店家，以及商業聚集場所。在投資住宅不動產方面，其中大學城地區住宅不動產的轉換與增加是學仕化過程中最明顯與特殊的空間特徵（Smith 2005b），在這個地區也未曾例外，尤其是發生在這二所高等教育機構設置之後的階段更為明顯。由於學生人口大量流入學仕化地區，使得當地的不動產市場必須提供足夠的消費空間以滿足學生的需求，一方面誘惑當地居民轉換原有居住型式以符合出租給學生的條件，另一方面促使大型不動產投資商家進入這個學生的不動產市場賺取利潤。這二項趨勢都刺激當地不動產市場交易的活絡與價格的提升，主要是來自於學生突然大量的進入這個社區所創造的需要，而原有地方不動產市場尚無法滿足這項需求的數量。如同一位不動產投資商所說的：

這裡的地都上漲了……因為我們看好這裡的地。剛開始不錯，幾乎都是學生要來租的，都要來排隊登記的。嘿！是拿錢排隊來登記的。（HM04：p.2，女性，安南區HMO不動產出租業者，從業10年）

新發生的學生住宅型式是這個地區最突出的地理景觀，這些所謂的「有目的興建的學生住宅」（purpose-built student accommodation, PBSA）——被視為「多重家戶的住宅」（HMO）的不動產，在理論化的討論中一直以來便扮演了學仕化地區的主要空間特徵。這類型的投資來源主要是來自於地方的大型建商，或非本地的投資客¹⁷，它的產品是為學生量身訂做的居住型式，具有現代的設計外觀，通常以3-4層集體住宅的量體方式為結構建築，提供50-100位租賃者每人4-5

17 如立興、臺邦與久誠等建設公司都是當地有推案成績的建築投資公司，甚至在臺南其他地區的大學城也有類似的學生住宅不動產租賃。

坪的居住空間，有共同的進出大門、迎客廳與停車空間，大多數都有提供物業管理的服務，以及一些共同使用的內部公共空間，如會客室、洗衣間、交誼室與茶水間等。但是，「有目的興建的學生住宅」的不動產外觀，很明顯與當地傳統舊有的住宅建築是截然不同的，回應在當地社區原有所呈現的農業聚落景觀之中，其實是一個二元地景的分化。多棟「高、大量體與現代建築設計的外觀」成為此處的特殊景觀，尤其是在十二佃這個傳統農業的聚落社區內，不只與這個社區內仍保留的傳統三合院，或農村建築產生強烈對比，還形成新的突出的天際線¹⁸。這個學仕化地區，這些傳統的平面式院落與巨大量體表達了——高／低、多重所有／個別所有、與現代公寓／傳統農厝的對立地景（見圖2）。對原始居民而言，它也表達二個不同群體居住的空間隔離：當地稱呼這些學生群體是「住公寓的」。

此外，商業不動產地景的加入，對以一級產業為主的傳統農業地區而言，是一項新鮮的刺激。這些新的商業設施的投入與當地不動產的轉換，以有投資當地零售業的單一店家等為例，他們主要服務的



圖2 學仕化地區的二元地景（學生宿舍與當地居住型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本研究於2010年8月24日攝製。左為十二佃社區，右為本淵寮社區。

18 這些3-4層樓建築型式的不動產，大多是受限於臺灣的土地使用管制的規定而興建的。以本研究調查的鄉村，或者稱為非都市地區為例，這些不動產所在的土地使用分區大多是都市計畫內的低密度住宅區、農業區，或是非都市土地的農牧用地。

對象是以大量的學生市場為目標，如影印店、小吃店、飲料店、機車行、文具用品店和便利店（如7-11或全家便利商店）等。儘管這些商業活動不一定是全然與學生有關的，但這些類型店家呈現在這個純樸的鄉村地區是很突兀的¹⁹。重要的是，這些具有豐富都市色彩的商業活動逐漸取代原來衰敗社區的沿街住宅，形成新的地景，同時，這些商店幾乎是在學校設置後的幾年內如雨後春筍般地發展出來，並且伴隨學校的到來，這些店家的服務對象則是以學生為主。不可否認的，這些商業活動的生產與存在與學生是息息相關的，如同其中一位複印店的老闆說明的：

這邊學生人數多就決定收入了嘛……最主要的就是剛好有店面空的要出租，然後所以才來這邊承租的……（而且）房租便宜嘛。（B01：p.1，男性，當地複印店家老闆）（括號內的文字為作者補充說明）

二、公共警覺的疏密

在國外的研究經驗中發現：學仕化地區由於學生粗率的生活習慣與對公共安全的低警覺度，加上學生擁有一些高吸引力且易轉讓的財產，常招致竊盜犯罪的發生（Universities U.K. 2006）。便是由於這二者的區別，類似的經驗在這個地區亦被證實。而發生這些重大的公共安全事件，對一個遵循傳統且生活純樸的社區而言，是極為不可思議的²⁰。

19 原因如同當地里長所陳述的——在於這個地區仍是較為傳統的農業聚落，居民的生活仍以自給自足為主，較少其他的商業消費行為，原有的社區消費能力是無法支持這類商業活動的存在（C01：pp.11-12，女性，里長，第一次訪談）。

20 訪談當地社區居民與房東（R04，男性，本淵寮居民，家戶租屋者，當地居住30多年；HM06，女性，安南區HMO不動產出租業者，從業6年）。

公學路（當地路名）學生宿舍遭竊問題，主要還是因為房門是採用喇叭鎖的關係，容易被撬開，一樓又沒鎖。（HMOmeeting：p.3，男性，安南區HMO不動產出租業者，學校學生租屋協調會議發言）（括號內的文字為作者補充說明）

另一類型的公共安全事件——交通事故，則與學生個人的行為模式有直接關係的。特別是，這類型的公共危險涉及了學生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機車」。由於學校所在地區缺乏較高服務水準的公共運輸系統，加上學生為了進出學校的便利性，以及為了實現與滿足自我的需要，通常會選擇以「機車」（俗稱摩托車）做為交通工具²¹，以這二所學校而言，學生選擇騎乘機車做為主要交通工具的比例是很高的，並且這個比例伴隨學生年級提升而上升²²。然而，「機車」對這個學仕化地區的負面影響卻是非常深化的，影響的不只是交通安全的考量而已，甚至包括本文之後所提及的噪音問題。因為學生對於遵守法制規範的意念較為淡薄，且沒有太多的公共意識，這使得學生莽撞騎乘機車的行為容易導致交通事故的發生，甚至危害到當地社區居民的生命與財產安全²³。

21 它一方面維持學生居住處所與學校之間的聯繫，另一方面則是在學生休閒或假日回家時，可以做為代步的工具，以減省時間的消耗。尤其是因為這二所新建大學位於都市外的郊區，平時進出城市中心不是非常方便的，於是機車便成為學生進出的主要交通工具。

22 以臺灣的行政法令規定，一般民眾在年滿18歲以後才可以申請取得重型機車的駕駛執照，輕型機車則為16歲以上。一般大學生入學年齡大約為18-19歲左右，正好符合此年齡的限制，然而由於安全性的考量，家長在學生進入大學後才會視大學生為成人，才會放寬學生騎乘機車的限制，加上家長解除對子女的限制愈晚則學生擁有機車的比率則有不同。此外，以位於城市郊區的這二個學校而言，機車成為學生代步工具是極為普遍的現象。因此，機車持有率會較高；但以城市內的大學而言，如臺北市，便捷的城市公共運輸系統使得學生的上學方式不一定仰賴機車，這個比率則會降低。

23 交通事故的發生是這個傳統地區警察最常處理的民事糾紛事件之一，尤其是學生騎車所引發的公共事故，已經成為當地重要的公共安全輔導重點。以當地一所大學為例，每學期（半年）因交通事件受傷的人次大約為50-60件左右，尚不包括學生自行處理的部分（H學院第12-16次交通安全委員會學生交通安全教育與交通事故分析檢討報告）。為了減少事件的發生，學校除了積極推動交通安全教育的工作之外，同時成立

他（學生）就闖紅燈啊！……我剛好在那呀！剛好一位男同學載女同學，就撞在那，有多恐怖，整個臉都抓起來。整個毀容啦！一直哭，手機東西掉滿地，連眼鏡都碎了。（R052：p.6，男性，十二個居民，當地居住40多年）
（括號內的文字為作者補充說明）

有啦，他們騎車都很快。吼！騎都橫衝直撞的。像我們這的老人啊都在說二所隔壁的大學沒進來，在走隨便走沒關係，但現在他們進來，換老人要閃這些讀書人了！
（R02：p.1，女性，十二個居民，當地居住50多年）

學生對於遵守共同法制規範的淺薄，對於公共空間領域的慣習規範認知不足，經常是這個學仕化地區公共危險發生的重要原因。其中，多重所有權住宅的特徵便是聚集許多不同的學生，必須共同生活在一棟集合住宅內，除了指定為自己所使用的空間之外，還有一些共同享用的公共空間²⁴。然而，這些公共空間，可能因為學生的草率行為而造成公共的危險，使得其他社區居民因此而衍生生命的威脅與財產的損失。

阿！抽菸也在公共設施（樓梯間）抽，不是在房間抽。如果你在房間抽，煙丟到菸灰缸丟掉，那你的事。不是在這邊公共設施這邊，整條走廊都是菸味，阿！不敢吸

委員會每學期固定開會檢討與提案，目的便是為了試圖降低學生的交通意外事故發生（HB01：p.3，男性，H學院教官；H學院第16次交通安全委員會學生交通安全教育與交通事故分析檢討報告）；另外，當地警察單位除了到校加強宣導以外，甚至在重要路口加強行車安全的維護與輔導，如設置警告標示或固定時段站崗協助交通疏通等（LP01：pp.4-6，男性，當地派出所主管）。

24 這個發生在「有目的興建的學生住宅」內的學仕化衝突與Garmendia et al.（2012）的調查成果有類似的結果。Garmendia et al.（2012）把學仕化的問題從社區的街道帶到集合公寓的公共空間內，說明居住民眾與承租住宅的學生之間的衝突與不協調問題，並且稱它為「垂直的學仕化」。而這些生活上的衝突與差異，造成了大樓的居住品質不良與不動產價格下降等的問題，甚至導致大量原有住戶搬遷的現象。

二手菸的人怕死了，說都說不聽。抽菸煙灰用的滿地都是……因為我們不能放菸灰缸鼓勵他們抽菸嘛！……阿！他灰都給你彈在地上，會整死你喔！阿！不然就是窗戶給你打開，往外彈……曾經有一次彈到，怎樣你知道嗎？他從這邊丟下去，結果丟到那個塑膠棚喲！燒起來了啊！（HM01：p.14，女性，安南區HMO不動產出租業者，從業7年）（括號內的文字為作者補充說明）

最後，就一個寧靜祥和的農村地區而言，過去這些人際上的衝突鮮少發生。學生特質與生活習慣這些的獨特行徑，則經常導致在公共空間領域和與人的接觸之中產生矛盾與衝突，這些矛盾與衝突甚至造成當地社區的公共危害²⁵，特殊的是，這些激烈的衝突都發生在晚間和夜間，發生的對象則是在學生與學生之間，大部分也會發生在學生與社區民眾之間，這與學生在晚間與夜間享受有高度的自由感是有關係的。

嗯！也有就是有跟在校或在外住宿生發生衝突的也有，嗯，這有可能的就是譬如說……，他這可能說隔壁同學打麻將太吵，然後隔壁學生，住在隔壁的學生不曉得跟他質問或者是想要跟他講清楚，他可能口氣上不好，然後兩個人就打起來。（HS01：pp.1-2，男性，H學院四年級學生）

也有送到過派出所的……，凌晨兩點多，在我們公學

25 這些衝突最終大多數都是由地方的警察單位處理，在處理完成後亦會通知學校有關單位前往協助，或後續追縱關切（LP01：pp.2-3，男性，當地派出所主管）。因此，學校學生輔導單位也會成為協調與溝通的代表之一。比較不同的，臺灣的學仕化不像西方城市嚴重至學生暴動的發生，在這個大學城區域，與社區居民產生言語摩擦或是身體衝突的事情是有發生的，甚至於，學生的粗暴行徑，如騎車亂闖造成當地社區居民生命的危害，則是被地方居民視為較嚴重的事件。這些危及社區安全的事件，除了藉由彼此容忍化解之外，嚴重時則需仰賴當地警政單位或里長出面協調解決，若未涉及生命或財產的安全，較少會要求警方立案處理或訴諸法律途徑的（HB01：p.3，男性，H學院教官；LP02：p.4，男性，當地警政人員，當地服務10多年）。儘管沒有明顯數據上的增加，在學生入駐這個傳統地區後，糾紛和衝突是明顯增加許多的。

路路口。在那邊，他們三、四個同學算是在買飲料在路邊閒聊，然後突然有那個當地的一個不良中年人……就來拎著（一個學生的）領子說什麼，說他們曾經擦撞過他的車跑掉了……要打架的……（HB01：p.2，男性，H學院教官）（括號內的文字為作者補充說明）

三、晝夜生活的反差

夜間活動對學生在大學的學習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它一方面代表了學生充分自我掌握的自由時間，可以不受拘束地學習成年人規劃自己的「寶貴」時間；另一方面它被視為對應於白天課業的規律，可以進行休閒娛樂活動的自我回饋的機會。比較本研究的樣本地區而言，其實在這個傳統且生活單純的地區，夜間活動項目是乏善可陳的，除了本淵寮廟口所提供的地方性商業與少數的娛樂活動之外，當地居民幾乎大部分的晚間活動都是在家收看電視、家門口聊天乘涼與休息，鮮少在居家之外地區進行其他的休閒活動²⁶。

這樣寂靜的夜間社區，相對於習慣夜間活動的學生而言，是相當截然不同的。因為學生是「夜行性動物」，只有在晚上或夜間才有自己的享受時間，特別是學生這個年青族群，對於夜間活動的安排與規劃是非常注重的，彷彿晚／夜間才是他們生活的重心²⁷。夜間休閒活動是屬於學生的，但是夜間活動是這個學仕化地區明顯又深刻的衝突癥結所在。這個衝突發生在原始住民與新進學生這類型見習仕紳者之間的生活作息矛盾之中：晚間正是當地居民在白天農忙結束後的休息時間，卻正是學生興致勃勃正要開始積極活動的時刻。社區居民大多是早睡早起，而學生則是晚睡晚起：早上是居民的工作時間，卻是大多數學生的睡眠時間；晚上與夜間是居民的休息與睡眠時間，卻是

26 訪談當地里長（C01：p.3，女性，里長，第一次訪談）。

27 焦點訪談（HS22、H23：pp.5-6，H學院四年級學生男性）。

多數學生的休閒活動時間²⁸。如此明顯的反差區別，加上學生在行動中缺乏生活道德的基本概念，完全不曾考量社區內另一類居民的生活權利，於是二個群體的衝突便產生了：

我啊！務農的啦！插秧的啦！四點就起來準備工具插秧，生活早起早睡。學生晚睡太吵啦！像H大學說實在的，「住在那種公寓的」很基礎喔，像是私人的那種，學生會帶學生，當作是租在這邊的，他們約同學都會來玩，瘋到半夜三、四點啊！（R02：pp.1-2，女性，十二個居民，當地居住50多年）（上下引號內的文字為作者補充說明）

就是早上去田裡工作他的那臺車（耕耘機），還有（車上的）擴音器！都很吵！（HS03：pp.6-7，男性，H學院四年級學生）（括弧內的文字為作者補充說明）

因為夜間活動所衍生的「噪音」，是二個族群嚴重衝突的理由所在。這些夜間活動的噪音主要來自於三個類型：一是學生呼嘯而過的騎車聲，二是學生聚集的吵鬧聲，三則是學生夜間大聲撥放音樂，或是打牌與玩鬧的聲音。這些藉由學生活動所發生的噪音，直接或間接地打擾了社區夜間的寧靜，也破壞了原始居民的規律生活。

原本我們晚上十一點睡，這邊都不會有車。很靜！靜悄悄的。現在到三點（學生的）車都蹦蹦叫！車子跑沒關係喔！你看你看學校學生那野狼機車的排氣管，都改過的，蹦蹦叫很大聲，晚上砰的一聲，又被吵醒了！（R04：p.6，男性，本淵寮居民，家戶租屋者，當地居住30多年）（括號內的文字為作者補充說明）

28 訪談當地居民（R011：p.4，女性，十二個居民，當地居住60多年）。

曾經有一次發生是怎樣的……每天打麻將靠近那邊（有其他社區住家的那邊）……打麻將打到二三點，而且還放那個重音樂！（HM01：p.23，女性，安南區HMO不動產出租業者，從業7年）（括號內的文字為作者補充說明）

他們都是在宿舍（有目的興建的學生宿舍）裡面！（有時候學生生活作息都比較晚睡晚起）比較吵是那宿舍旁居民的問題啦！……以前這邊也有租啊！真的很吵，喝酒啦！在宿舍裡很大聲。現在沒租了，就比較安靜！（R06：p.2，女性，本淵寮居民，當地居住50多年）（第一個括號內的文字為作者補充說明）（第二個括號內的文字為另一位同時受訪者所述）

學生所製造的夜間噪音，經常引起當地社區居民的不滿情緒是不可否認的，然而，在這個調查中發現，由於學生的行為與態度很難藉由學校與房東給予嚴格的限制，即使建議也難為學生所接受，使得問題一再的發生而無法有效的扼止。更嚴重的是，這些夜間活動長久以來所衍生的噪音問題，不只是一項嚴重的空間衝突，也得讓當地居民必須忍受與自我調節。唯一可以改善夜間喧鬧的辦法，便是將問題提升到社會安全的層面，要求地方治安單位的協助與處理，以紓解社區內兩個對立群體之間的緊張關係。

很晚回來就會吵到……後來都叫警察啦！住在後面的（社會人士）覺得他們（學生）那邊很吵，跑來打他們，最後還叫來警察，之後房東就沒租了。（R04：p.6，男性，本淵寮居民，家戶租屋者，當地居住30多年）（第一個括號內的文字為另一位同時受訪者所述）（第二個括號內的文字為作者補充說明）

四、地方認同的分歧

相對於地方居民而言，大學生在這裡的停留是「短暫的」、「季節性的」、以及「移動性高的」（Smith and Holt 2007），這使得學生無法完全擁有與原始居民一樣對地方的歸屬感。依大學生他們的人生週期而言，在學仕化地區可以停留的時間最多只有四到六年的時間。學生像候鳥一樣，沒有長期居住的打算，每年寒、暑假非學制時間便來去自如，學仕化地區也就如同季節的變化轉換不同的時空氛圍與地方地景——學期時間充滿學生，非學期時間回歸原有社區（吳貞儀、簡博秀 2009a）。這個季節性的因素，使得大學生認為這裡的居住條件只是配合求學的需要，是短暫且附屬性的，不會長久，它畢竟不是「自己的家」，只是臨時性的住所²⁹。學生群體的個人特質與生活模式，使得學生無法輕易地融入社區，並且無法扮演與社區居民一樣的角色與行為，更遑論他們在這個地區並未具有的政治參與權利，也不曾對地方的選舉權利有任何憧憬與想像（Smith 2008）。這些無形的阻礙，不只是加深學生參與社區活動的困難，更讓學生失去建立地方歸屬的條件³⁰。沒有歸屬感，當然學生說明「他們」不是社區的一份子，他們只是臨時短暫地居住於此，與社區是無關的，是「其他的人」（others）：他們不是「在地人」，他們是這裡的「消費者」（consumer），有權利為他們所支付的房租追求較好的生活品質，因此在消費權利受到危害時，他們便會很有理由地提出權利的宣告，而未曾顧及團體生活必要的妥協與協調手段。

29 焦點訪談（HS04：p.7，男性，H學院四年級學生）。

30 大學生究竟在社區內應該扮演如何的角色？以及大學生對社區應該要有如何貢獻？這對在臺灣學術研究議題上一直是非常直接的且正面的觀點。實際上，在臺灣的大學教育過程和內容中，高等教育機構為了維持與鄰近社區的關係，以及為了培養學生參與公共事務的參與感，許多大學都會透過要求學生進行公共服務的課程，達到以上的目的。然後，這些安排與規劃是否真正讓現今的大學生學習主動與積極參與社區的公共議題，這是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過去我們這有廟會，……都有KTV啦！也差不多（晚上）十點多就結束，結果（學生）投訴到警察局，裡面投訴的說很吵。像這種一年二次的就說很吵。啊你們學校一年辦幾次啊？我們都沒有聽到嗎（憤怒）？……我們居住比較久耶。其實是租在隔壁的學生去投訴的啦！那天警察也來啊！也說這也才一、二天而已，有需要這樣嗎？！（R011_1：pp.2-3，男性，十二佃居民，當地居住40多年）（括號內的文字為作者補充說明）

最後一個有關地方認同的現象，則在於不同世代對於感情價值觀的經營與隔代文化的差異。不可諱言的，每一世代對愛情的詮釋都受限於當時的社會環境與文化風俗影響，而產生不同的愛情價值觀³¹。然而，這個不同的價值認同發生在同一個空間之中，便產生了文化差異的衝突。特別是對這二處傳統且高齡人口為主的社區而言，學生情侶的親暱舉動常招致當地民眾的議論，並且被視為的「逾矩」行為。

只是有些男女朋友在路上親熱，啊！我們庄裡的人看到了很不習慣！阿有人（社區居民）說，唉！里長你跟他們（學生）說啦！叫他們去房裡親熱啦！有啦！差不多第二第三年都有……就在（十二佃大廟）路旁親熱。阿人家（社區居民）就會打電話……喂！里長里長，快一點，發生事情了啦！就這樣啊！我（里長）就故意從旁邊走過去，再走過去……就這樣……但我不會跟他們（學生）講啦！那好意思跟他們講！（C01：p.4，女性，里長，第一次訪談）（括號內的文字為作者補充說明）

31 對新的世代而言，開放、自由放縱與速食愛情已經取代過去保守、自我矜持和操守清白的傳統愛情價值觀（林璐安等 2007）。

伍、討論與結論

近年來仕紳化概念被多樣地引用在其他的空間發展與都市政策的論述內容之中，其中學仕化便是其中的一類型代表。這類型的研究主要的討論內容，在於高等教育機構的投資對地方發展的效果與影響，以及強調國家在這個空間過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同於仕紳化透過中產階級的下瀆效果重新啟動舊社區的發展，學仕化則是藉由學生扮演所謂的仕紳者的條件討論學生與社區的互動關係，以及如何平衡學校對地方發展所帶來的衝擊（Wu and Jian 2010）。然而，在近年已有的討論成果中發現，學生與社區之間的互動是非常負面的，包括對原有居民生活品質的衝擊與降低不動產的價格，甚至嚴重影響原始傳統居民的生活空間秩序，以及繼續居住的意願（Hubbard 2008; Smith 2005b）。

在這些先驗研究的論述之下，本研究以臺南市郊區二所大學做為例子，說明發生在臺灣高等教育擴招後所設立的新建大學對當地社區的影響，並藉由說明這個結果暗示臺灣學仕化政策上的迷思。在研究中發現：在學生大量湧入社區以後，除了帶來不動產部門部分的實質經濟助益之外，在社會、文化和實體等方面的負面影響卻是明顯的事實。研究的結論指出：不動產投資刺激所形成二元隔離地景、公共危險的增加、吵鬧的夜晚生活、以及對當地社區認同感的薄弱等方面，都形成學生與當地居民格格不入、產生對立的理由，也便形成了在社區中學生與當地居民彼此冷漠的社會關係。這些被當地稱做「住公寓的」學生，住在有目的興建的住宅裡，享受當地所提供的飲食娛樂活動，白天上課，晚上則成群結隊聚集喧嘩，或者製造不同的噪音影響當地鄰里的夜間寧靜，他們對當地缺乏歸屬感，無法融入地方文化，低警覺性又易招致公共危險等，使得當地居民不勝其擾（見表2）。明顯的，學生的特質是與當地居民不相同的，是不被當地民眾認為是

同一個社區的居民。因此，在學仕化之後，原始傳統居民的旁邊則居住了一群「不像我們一樣的人」（Sage et al. 2012b）。

本文引用Smith and Holt（2007）對學生群體的敘述——他們認為這些代表學仕化最主要作用者的學生事實上僅是「見習仕紳者」，非全然仕紳者，做為解釋在學生地區產生社會隔離的一個理由——這便是這些學生是一群尚未成年、週期性地且短暫居住在這裡的特定群體，他們與仕紳者是有相當不同的。便是由於學仕者是短暫居住在這個地方，並沒有長時間的打算，而且每年只有上課的時間會週期性地停留在此處，像是候鳥一樣，因此，他們對地方的影響不會像仕紳者來的如此明顯；便是由於學仕者是一群未成年的大學生，心智尚未成熟，並且第一次離開家庭，獨自生活，像剛離開家的雛鳥一樣，甚至面臨人格叛離的階段，因此，他們對地方的融合傾向，不會像仕紳者如此積極。這些論述支持了現今多數學仕化研究偏向於說明學生與當地社區居民之間的隔離關係，同時把兩者之間關係調節視為社區永續

表2 臺南郊區大學社區當地居民與學生之間差異的比較

當地居民	大學生
居住在傳統三合院，或透天厝	有目的興建的學生住宅、「住公寓的」
基本生活的消費	飲食娛樂的消費活動
晚上早睡休息、白天早起工作	晚上晚睡娛樂、早上晚起上課
晚上寧靜	晚上的播放嘈雜音樂、成群結黨聚集喧鬧和夜間街道噪音干擾
社會淳樸，較少犯罪事實	警覺性較低、擁有高吸引力的財產，引誘犯罪行為增加
步行或輕便代步工具（部分農作時使用農機工具）	高頻率使用機車（帶來夜間噪音與交通安全的危害）
社區內居民關係密切	行為獨立，較少社區交流
世代居住，高地方認同	非長期居住，低歸屬感
傳統保守的文化	年輕人的新世代文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發展命題 (Hubbard 2008; Sage et al. 2012a, 2013; Smith 2008)。這個事實，不只反應了學校與社區之間矛盾的情緒，同時也向上反應了國家在執行類似學仕化空間政策時所未能預測的結果。儘管如同中產階級這些仕紳者一樣，學生被視為可以帶動一個地方發展的啟動者，但是由於學生所具有的特質，使得被入侵的社區無法如預期地得到完全的好處，卻引來更多生活上的不便與社會安全問題。最後，研究中所要提醒的是，在現今高等教育政策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下，現今研究社區的發展仍是變動且不穩定的，尤其近年來在臺灣少子女化的衝擊下，該地區明顯呈現學生銳減的窘境，正面臨空間與社會再結構的過程，相對於臺灣一些衝突較小的傳統大學社區而言，新建大學的社區是否仍會維持一個新的社會結構的平衡與永續發展？仍值得後續更多的追蹤與研究。

謝誌

本文接受國科會（現為科技部）101學年專案計畫補助獎助（計畫名稱為〈臺灣：學仕化它的研究議題（編號NSC 101-2410-H-128-042）〉）和世新大學102學年學術研究專案補助（專案名為〈雙元的社區：學仕化與臺灣的新建大學（編號P10306）〉）。作者感謝三位匿名評審的建議，以及吳貞儀、尤意汶、陳思潔、許家榮和胡培貞等同學的協助調查。

airiti
參考文獻

- H管理學院（1997）H管理學院設置申請書。台糖未出版報告。
- 林生傳（2004）臺灣近期教育改革的透視與省思。教育學刊，23: 1-35。
- 林璐安、林定玉、李宜柔、林雅雯（2007）N世代大學生愛情價值觀與工作價值觀之研究。龍華科技大學學報，22: 135-159。
- 吳貞儀、簡博秀（2009a）學仕化：候鳥人口與不平衡的社區。2009年第七屆土地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9月18日。
- 吳貞儀、簡博秀（2009b）學仕化議程與臺灣的大學空間政策。土地問題研究季刊，8(4): 91-107。
- 柯鴻彬（2008）臺灣高等教育機構經營與管理之研究——大學校院教師之意見調查。國立嘉義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郭碧英（2006）臺灣地區高等教育政策分析。玄奘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 薛曉華（1996）臺灣民間教育改革運動：國家與社會的分析。臺北：前衛。
- 戴伯芬、林宗弘、吳燕秋、陳思仁、林凱衡、揮塵子（2015）高教崩壞：市場化、官僚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臺北：群學。
- 簡博秀（2011）學仕化與它的研究議題：以臺灣為例。2011年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11月18日。
- 簡博秀（2013）臺灣：學仕化、國家再層域化與不動產投資。第十屆中國城市住宅研討會論文，上海：香港中文大學住宅研究中心，7月8日。
- Atkinson, R. and G. Bridge. (eds.) 2005. *Gentrification in a Global Context*:

The New Urban Colonialism. London: Routledge.

- Armstrong, H. W., J. Darrall, and R. Grove-White. 1997. "Maximising the Local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Benefits of a University: Lancaster University." *GeoJournal* 41(4): 339-350.
- Betancur, J. J. 2002. "The Politics of Gentrification: The Case of West Town in Chicago." *Urban Affairs Review* 37(6): 780-814.
- Boersma, K., H. Langen, and P. Smets. 2013. "Paradoxes of Studentification: Social Mix Versus Gentrification in a Disadvantaged Neighborhood in Amsterdam East." *The Open Urban Studies Journal* 6:40-49.
- Bromley, R. D. F., A. R. Tallon, and A. J. Roberts. 2007. "New Populations in the British City Centre: Evidence of Social Change from the Census and Household Surveys." *Geoforum* 38(1): 138-154.
- Bulter, T. and G. Robson. 2003. *London Calling: The Middle Classes and the Re-Making of Inner London*. Oxford, UK: Berg.
- Chatterton, P. 1999.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City Centres -- The Formation of Exclusive Geographies: The Case of Bristol, UK." *Geoforum* 30(2): 117-133.
- Chatterton, P. 2000. "The Cultural Role of Universities in the Community: Revisiting the University -- Community Debat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2(1): 165-181.
- Chatterton, P. 2010. "The Student City: An Ongoing Story of Neoliberalism, Gentrification, and Commodificati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2(3): 509-514.
- Chatterton, P. and R. Hollands. 2002. "Theorising Urban Playscapes: Producing, Regulating and Consuming Youthful Nightlife City Spaces." *Urban Studies* 39(1): 95-116.
- Collins, F. L. 201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 Urban Agent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Auckland, New Zealand."

Geoforum 41(6): 940-950.

- Davison, G. 2009. "Carlton and the Campus: The University and the Gentrification of Inner Melbourne 1958-75." *Urban Policy and Research* 27(3): 253-264.
- Davidson, M. 2009. "London's Blue Ribbon Network: Riverside Renaissance Along the Thames." Pp.173-191 in *Regenerating London: Governance, Sustainability and Community in a Global City*, edited by R. Imrie, L. Lees, and M. Raco. London: Routledge.
- Demant, J. and S. Landolt. 2014. "Youth Drinking in Public Places: The Production of Drinking Spaces in and Outside Nightlife Areas." *Urban Studies* 51(1): 170-184.
- Dorling, D. 2005. *Human Geography of the UK*. London: Sage.
- Fabula, S., D. Horváth, L. Boros, and Z. Kovács. 2015. "The Contradictory Effects of Studentification and Social Diversification on the Social Cohesion of Józsefváros/Budapest." Paper presented at Young Divercities: Encountering and Living with Hyper-Diversity: Young People's Urban Experiences. Utrecht, The Netherlands, November 5-6.
- Fincher, R. and K. Shaw. 2011. "Enacting Separate Social Worlds: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Students in Public Space in Central Melbourne." *Geoforum* 42(5): 539-549.
- Garmendia, M., J. M. Coronado, and J. M. Ureña. 2012. "University Students Sharing Flats: When Studentification Becomes Vertical." *Urban Studies* 49(12): 2651-2668.
- Glasson, J. 2003. "The Widening Loc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mpacts of the Modern Universities -- A Tale of Two Cities (and North-South Perspectives)." *Local Economy* 18(1): 21-37.
- Grabkowska, M. 2011. "Inner-City Transformations After Socialism: Findings from Interviews with New Residents of Pre-War Tenement

Houses in Gdańsk.” *Bulletin of Geography Socio-Economic Series* 15(5): 117-129.

- Hall, P. 1997. “The University and the City.” *GeoJournal* 41: 301-309.
- Harloe, M. and B. Perry. 2004. “Universities, Localiti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 2’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8(1): 212-223.
- He, S. 2015. “Consuming Urban Living in ‘Villages in the City’: Studentification in Guangzhou, China.” *Urban Studies* 52(15): 2849-2873.
- Holdsworth, C. 2009. “Between Two Worlds: Local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Scouse’/ Student Identities.”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5(3): 225-237.
- Hollands, R. 2002. “Divisions in the Dark: Young Cultures, Transitions and Segmented Consumption Spaces in the Night-Time Economy.”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5(2): 153-171.
- Hollands, R. and P. Chatterton. 2003. “Producing Nightlife in the New Urban Entertainment Economy: Corporatization, Branding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7(2): 361-385.
- Holt, M. and C. Griffin. 2005. “Students Versus Locals: Young Adults’ Constructions of the Working-Class Other.”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4(2): 241-267.
- Hubbard, P. 2008. “Regulating the Social Impacts of Studentification: A Loughborough Case Stud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0(2): 323-341.
- Hubbard, P. 2009. “Geographies of Studentification and Purpose-Built Student Accommodation: Leading Separate Liv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1(8): 1903-1923.

- Lambooy, J. G. 1997. "Knowledge Production, Organisation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GeoJournal* 41(4): 293-300.
- Ley, D. 1996. *The New Middle Clas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Central Cit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tin, L., H. Smith, and W. Phillips. 2005. "Bridging 'Town and Gown' through Innovative University-Community Partnerships." *The Innovation Journal: The Public Sector Innovation Journal* 10(2): 1-16.
- Munro, M., I. Turok, and M. Livingston. 2009. "Students in Citie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ir Patterns and Effect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1(8): 1805-1825.
- Munro, M. and M. Livingston. 2012. "Student Impacts on Urban Neighbourhoods: Policy Approaches, Discourses and Dilemmas." *Urban Studies* 49(8): 1679-1694.
- Ordor, U., K. Cattell, K. Michell, and P. Bowen. 2010. "The Effects of Studentification on the Residential Neighbourhood of A University Suburb: A Stud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in Rondebosch." Pp. 543-556 in *Proceedings of the CIB W07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Facilities Management -- FM in the Experience Economy*, edited by M. E. A. Da Graça. Delft, The Netherlands: CIB.
- Sabri, S., L. Muhamad, and A. Nazri. 2009. "Studentification Is It a Key Factor Within the Residenti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Kuala Lumpur?" Paper presented at South East Asian Technical Universities Consortium (SEATUC) -- 3rd SEATUC Symposium Proceeding. Johor Bahru, Malaysia, February 25-26.
- Sage, J., D. Smith, and P. Hubbard. 2012a. "The Rapidity of Studentification and Population Change: There Goes the (Student)hood."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8(5): 597-613.
- Sage, J., D. Smith, and P. Hubbard. 2012b. "The Diverse Geographies of

Studentification: Living Alongside People not Like Us.” *Housing Studies* 27(8): 1057-1078.

Sage, J., D. Smith, and P. Hubbard. 2013. “New-Build Studentification: A Panacea for Balanced Communities?” *Urban Studies* 50(13): 2623-2641.

Scott, A. J., A. Lewis, and S. E. G. Lea. 2001. *Student Debt: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Undergraduate Borrowing in the UK*. Bristol, UK: Policy Press.

Smith, D. P. 2005a. “Patterns and Processes of ‘Studentification’ in Leeds.” *The Regional Review* 12: 14-16.

Smith, D. P. 2005b. “Studentification: The Gentrification Factory.” Pp.72-89 in *Gentrification in a Global Context: The New Urban Colonialism*, edited by R. Atkinson and G. Bridge. London: Routledge.

Smith, D. P. 2008. “The Politics of Studentification and ‘(Un)balanced’ Urban Populations: Lessons for Gentrification and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Urban Studies* 45(12): 2541-2564.

Smith, D. P. 2009. “‘Student Geographies,’ Urban Restructuring, and the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1(8): 1795-1804.

Smith, D. P. and L. Holt. 2007. “Studentification and ‘Apprentice’ Gentrifiers Within Britain’s Provincial Towns and Cities: Extending the Meaning of Gentrificati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9(1): 142-161.

Smith, H. A. 2003. “Planning, Policy and Polarisation in Vancouver’s Downtown Eastside.”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94(4): 496-509.

Smith, N. 1996. *New Urban Frontier: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 London: Routledge.

- Tallon, A. R., R. D. F. Bromley, B. Reynolds, and C. J. Thomas. 2006. "Developing Leisure and Cultural Attractions in the Regional City Centre: A Policy Perspectiv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Politics and Space* 24(3): 351-370.
- Universities U. K. 2006. *Studentification: A Guide to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Practice*. London: Universities UK.
- Van Liempt, I., I. van Aalst, and T. Schwanen. 2015. "Introduction: Geographies of the Urban Night." *Urban Studies* 52(3): 407-421.
- Walks, R. A. 2001. "The Social Ecology of the Post-Fordist/Global Cit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Socio-Spatial Polarisation in the Toronto Urban Region." *Urban Studies* 38(3):407-447.
- Wattis, L. 2013. "Class, Students and Place: Encountering Locality in a Post-Industrial Landscape." *Urban Studies* 50(12): 2425-2440.
- Winchester, H. P. M. and P. E. White. 1998. "The Location of Marginalised Groups in the Inner C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6(1): 37-54.
- Woldoff, R. A., T. DeCola, and R. C. Litchfield. 2011. "The Aspirational Creative Class: Urban Residential Preference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reative Majors." *City, Culture and Society* 2(2): 75-83.
- Wu, C. Y. and B. X. Jian. 2010. "Studentification: Social, Cultural and Spatial Regul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ICSU 2010). Kowloon, Hong Kong, December 15-17.
- Wyly, E. K. and D. J. Hammel. 2004. "Gentrification, Segreg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in the American Urban Syste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6(7): 1215-1241.

附錄：研究訪談對象條件補充與說明

研究方法			
受訪對象 (編碼字首)	人次 (次數)	定義關係	關係議題 (部分為訪後議題)
			受訪抽樣說明
		深度訪談 (半結構性) 自2008-2016年之間	
學校行政人員 (HB)	2 ⁽⁶⁾	管理者、衝突 協調者	1. 學校與社區的結構與互動 2. 學校住宿政策與提供現況 3. 學生租賃人口結構與偏好 4. 學生租賃調查與衝突的調解 5. 學生與社區衝突類型與案例
里長 (C)	2 ⁽⁶⁾	管理者、衝突 協調者	1. 為當地傳統居民 2. 為地方意見領袖 3. 分別包括學校範圍內所影響里鄰為代表 (佃東/公塆)
			1. 重大政府政策的地方影響 2. 地方對設校的態度與轉變 3. 學校與社區的結構與互動 4. 地方居民的意見陳述 5. 投資者對地方發展的貢獻

附錄：研究訪談對象條件補充與說明（續）

研究方法				
受訪對象（編碼字首）	人次 (次數)	定義關係	關係議題 (部分為訪後議題)	受訪抽樣說明
房東 (HM)	3	生產者、投資者、當地傳統居民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不動產投資的背景與動機 2. 投資的方式、偏好與回收 3. 商品或再商品化的內容 4. 與租賃者的互動與協調 5. 對地方發展的期許與調適 6. 租賃的管理與推銷 7. 景氣的波動與調節的策略 8. 社區的回應與回饋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為小型投資者（再商品化） 2. 由租賃學生引薦 3. 由當地里長引薦 1. 為大型投資者 2. 部分為地方跨區投資者 3. 由租賃學生或教官引薦 4. 藉由「假客戶」身份隨機訪談
不動產從業人員 (RE)	2 ⁽³⁾	投資者、利益協調者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重大政府政策的地方影響 2. 當地的不動產市場動態 3. 當地不動產投資類型與型態 4. 學仕化後影響的具體事實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為當地從事不動產 2. 仲介與熟悉市場交易人員 3. 授課學生或業界推薦
附近商家 (B)	8 ⁽¹⁰⁾	生產者、投資者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投資的背景與動機 2. 交易的市場需求與頻率 3. 投資的方式、偏好與回收 4. 商品與服務的內容 5. 對地方發展的期許與調適 6. 景氣的波動與調節的策略 7. 與學生的互動與回饋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鄰近學生所接觸的影印店、飲料店、機車行、餐飲（便當）店、文具店和夜市部分攤販等商家 2. 部分藉由「假客戶」身份隨機訪談 3. 因涉及店家營業機密，部分為非正式訪談（未有具體文字記錄，僅訪談筆記）

附錄：研究訪談對象條件補充與說明（續）

研究方法	
受訪對象（編碼字首）	關係議題 （部分為訪後議題）
當地居民 (R)	<p>12* 當地傳統居民</p> <p>1. 學仕化後影響的具體事實 2. 對學生入駐後的地方描述 3. 對學生的觀感與互動的描述 4. 學生與社區衝突的重大事件 5. 衝突的回應與調解</p> <p>12* 當地傳統居民</p> <p>1. 學仕化後影響的具體事實 2. 當地居民反映回饋 3. 學生與社區衝突的重大事件 4. 學生易發性事件內容與調解 5. 學校與社區之間的協調</p>
當地警察及執法人員 (LP)	<p>2⁽¹⁾ 衝突協調者</p> <p>1. 分別包括當地派出所員警與分局保安警察 2. 由學校教官引薦</p>
學生 (HS)	<p>焦點團體訪談自2008-2012年之間</p> <p>6⁽²⁾ 消費者</p> <p>1. 該校四年級學生／畢業生 2. 該學生為持續性訪談對象</p> <p>5 該校三年級學生</p> <p>4 該校四年級學生</p> <p>5 該校三／四年級學生 請由受訪房東引薦</p>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欄位中「人次」是指受訪者人數。括弧內數字為該項人數所進行（合計）的訪談次數。

Studentification and Social Segregation: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Local Residents

Po-Hsiu Chien *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observation of the spatial scale of community affected by studentification, this article tried to explain a contradiction stemming from a dominant doctrine that “developing a university town will inspire local developments through state regulation.” Recently, this doctrine was supported by the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in Taiwan, which provided a reasonable excuse to develop new university towns in many cities. Following the suggestions of empirical studies on social division emerging due to studentification, this paper found that social segregation was a condition of the country landscape in southern Taiwan, resulting from the different identity between students at the new-build universities and inhabitants of communities near the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ose conditions, including the dualistic landscape formed by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he students’ disregard for safety in public spaces, the stirring night economy triggered by students, and the student’s failure to cultivate a sense of community identity, established a two-sided situ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others in the community, and exacerbated the lack of mutual concer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same community.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social segregation in studentified areas resulted from the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ourism, Shih-Hsin University.
E-mail: titanbxj@mail.shu.edu.tw

personal character of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deeply lacked the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local community. The Key findings are that the immature way of life of incoming students, and their temporary stay as migratory birds acted as negative influences, which indeed denied the weak doctrine in studentified communities.

Keywords: studentificatio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HEIs), social segregation, apprentice gentrifier, community